

父母元情绪理念、情绪表达与儿童社会能力的关系^{*}

梁宗保¹ 张光珍¹ 陈会昌² 张 萍³

(¹ 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南京 210096)

(²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北京 100875) (³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 对 341 名学前儿童及其父母进行问卷调查, 考察父母元情绪理念、情绪表达与儿童社会能力的直接与间接关系。结果表明: (1) 父亲情绪教导对儿童社会能力有促进作用, 而情绪紊乱对儿童社会能力有阻碍作用; 父亲的积极情绪表达对儿童社会能力有促进作用, 消极情绪表达则有负向作用; 此外, 父亲情绪教导、情绪紊乱除了对儿童社会能力具有直接作用外, 还通过其情绪表达对儿童社会能力具有间接影响。(2) 母亲情绪教导对儿童社会能力具有积极作用, 而情绪紊乱则具有消极影响; 母亲积极情绪表达对儿童社会能力有促进作用, 而消极情绪表达对儿童社会能力无显著预测关系; 母亲情绪教导通过其积极情绪表达对儿童社会能力具有间接促进作用。

关键词 学前儿童; 父母元情绪理念; 父母情绪表达; 社会能力; 中介效应

分类号 B844

1 问题提出

社会能力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一项重要技能, 对个体后期的社会适应具有重要意义(Rose-Krasor, 1997)。虽然研究者从技能、关系、社交地位、功能结果等不同层面对儿童社会能力进行了分析和界定(Rose-Krasor, 1997), 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在社交活动中取得人际成功, 表现出恰当的社会行为是社会能力的本质内涵(Rose-Krasor, 1997; Chen & French, 2008)。因此, 我们认为儿童社会能力是指儿童在社会情境中获得人际成功的能力, 特别是主动发起社交活动以及在社交情境中表现出适当行为的能力。

家庭是儿童早期社会化的重要场所, 父母的养育理念和行为, 家庭情绪氛围等都是儿童早期社会能力习得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年来, 从父母情绪社会化(parental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的视角来探索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已成为一个新热点(Eisenberg, Cuberland, & Spinrad, 1998; Isley, O'Neil, Clatfelter, & Parke, 1999; Chaplin, Cole, &

Zahn-Waxler, 2005; Denham, 2010)。父母情绪社会化是指父母所持的情绪理念或观念, 以及亲子日常交往中表现出的相关情绪行为对儿童情绪和社会行为的塑造和教育过程(Gottman, Katz, & Hooven, 1996, 1997; Denham & Burton, 2003; Eisenberg et al., 1998)。

不同父母所持的情绪理念不同。有的父母认为儿童的消极情绪是坏的, 不利于儿童情绪的发展。因此极力要求儿童控制消极情绪, 并尽可能采取减少、忽视、否认等措施来防止或阻止儿童表达消极情绪。而有的父母认为儿童的消极情绪是亲子亲密接触的机会, 并鼓励儿童以社会接纳的方式表达消极情绪, 当儿童表现出消极情绪后, 父母则给予更多的鼓励和关注(Gottman et al., 1996, 1997; Eisenberg et al., 1998)。因此, 有研究者用父母元情绪理念来描述父母情绪社会化的目标和理念, 即父母对自我或其子女情绪行为的一种认知态度与情绪反应特征(Gottman et al., 1996, 1997; 叶光辉, 2002)。Gottman 等人(Gottman et al., 1996, 1997; Katz & Windecker-Nelson, 2004)认为父母元情绪理

收稿日期: 2010-09-29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青年基金(10YJCXLX026); 东南大学自然科学基金预研项目(9250180012)。

通讯作者: 陈会昌, E-mail: chen47hc@yahoo.com.cn; 张光珍, E-mail: zhangguangzhen@seu.edu.cn

念可分为情绪教导(emotion coaching)、情绪摒除(emotion dismissing)、情绪紊乱(emotion dysfunction)三类。叶光辉(2002)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中国亲子间日常互动的观察发现中国父母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对儿童的消极情绪无明确的态度或反应倾向。儿童表现出消极情绪后,一些父母大多数时候会任由孩子表达任何情绪而不予干涉或反应,也不认为自己对孩子的情绪发展可以产生任何作用,主张顺其自然是处理儿童情绪问题的最佳方式。因此,叶光辉(2002)将其命名为情绪不干涉元情绪理念(emotion noninvolvement),他认为情绪不干涉也是中国父母比较常见的元情绪理念之一。在叶光辉等人(叶光辉,郑欣佩,杨永端,2005)后来编制的问卷中,因子分析的结果也表明中国父母的元情绪理念中除了情绪教导、情绪摒除、情绪紊乱外,情绪不干涉也是一个独立的维度。但在西方现有研究文献中,尚未发现情绪不干涉的元情绪理念。所以,情绪不干涉可能是中国父母特有的一种元情绪理念。

情绪教导理念指父母对自己和孩子的情绪知觉敏感,了解孩子的各种情绪反应,帮助孩子正确指称情绪感受,与孩子共同解决情绪问题。情绪摒除理念指父母认为消极情绪对孩子是有害的,会尽快改变或消除消极情绪,并让孩子意识到消极情绪不值得重视和关注,尽可能地忽略它,常常以转移注意力或惩罚来消除孩子的消极情绪。情绪紊乱理念指父母难以调节自己与孩子的消极情绪,短期内难以平复。情绪不干涉理念指父母对孩子的消极情绪反应无特别的态度和意向,放任孩子自由表达任何情绪而不予干涉或反应。

父母不同的元情绪理念又会引发不同的情绪反应、情绪表达、情绪教导方式等情绪社会化行为(Gottman et al., 1996, 1997; Denham & Grout, 1993; 叶光辉, 2002)。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是指父母在情绪社会化过程中表现出的情绪相关行为(Eisenberg et al., 1998; Denham & Burton, 2003)。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主要表现在对儿童情绪的回应,与儿童对情绪原因和结果的讨论,以及父母情绪表达三个方面。实证研究表明,情绪教导元情绪理念占主导的父母,面对儿童的消极情绪反应,会给予儿童更多接纳和温暖的情绪反应,与儿童心平气和地讨论消极情绪产生的原因,教导儿童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应对,在日常家庭生活中,表达更多积极情绪(Gottman et al., 1996, 1997; Katz & Windecker-Nelson, 2006)。持有情绪摒除理念的父母,更容易表达出烦

躁、愤怒等消极情绪。持有情绪紊乱理念的父母,其情绪表达的模式较为复杂,消极情绪持续的时间较长,且难以平复。持有情绪不干涉元情绪理念的父母,在亲子互动中很少表现出特定的情绪,更多表现的是中性情绪(Gottman et al., 1996, 1997; 叶光辉等, 2005)。

父母情绪社会化的理念、行为与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学前期到青少年晚期,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能力存在直接或间接关系。首先,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能力直接相关。有研究发现,母亲情绪教导能直接预测学前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母亲在情绪教导理念上的得分越高,其儿童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Lagacé-Séguin & Coplan, 2005)。此外,母亲情绪摒除的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的行为调节能力、社会能力负相关,而与问题行为正相关(Lunkenheimer, Shields, & Cortina, 2007)。在青少年中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高抑郁水平青少年的母亲比低抑郁水平青少年的母亲更少接纳和表达自己的情绪,且更多地持有情绪摒除的情绪理念。低抑郁水平青少年的母亲则更多地持有情绪教导的元情绪理念,在亲子互动中的烦躁情绪较少,其青少年的情绪抑郁症状更少,社会能力较强,问题行为也较少(Katz & Hunter, 2007)。另外,类似结果在学前儿童的样本中也得以证实(Katz & Windecker-Nelson, 2004)。其次,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能力间接相关。Gottman等人(Gottman et al., 1996, 1997)的研究发现,父母的情绪教导和情绪觉察除了与学前儿童的同伴关系直接相关外,还通过儿童的生理调控、情绪调控及父母养育方式对儿童社会能力起着间接作用。也有研究发现,父母情绪教导除了与儿童行为问题、社会能力直接相关外,还对家庭暴力的消极影响具有延缓作用(Katz & Windecker-Nelson, 2006)。由此可见,父母元情绪理念对儿童社会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影响作用可能从童年早期持续到青少年晚期。

情绪表达是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儿童社会能力和情绪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Denham, Mitchell-Copeland, Strandberg, Auerbach, & Blair, 1997; Isley et al., 1999; Denham & Burton, 2003)。父母情绪表达指父母在家庭中以言语或非言语形式表现出与情绪相关,但并非总伴随着情绪的主要风格或模式(Halberstadt, Cassidy, Stifter, Parke, & Fox, 1995)。首先,现有研究表明,父母情绪表达与儿童社会能力密切相关。有研究发

现,在亲子互动中经常表现出温暖、积极情绪的父母,其子女通常会表现较强的社会能力,而敌意、攻击等问题行为较少(Dunn & Brown, 1994; McElwain, Halberstadt, & Volling 2007)。儿童会利用与父母交往的机会学习对情绪信号的解码,并且把学习到的解码技能运用到社交情景中(Parke & Buriel, 1998)。经常处于父母消极情绪表达氛围中的儿童,更少地被同伴接纳,教师评价的社会能力也较低,而那些处于父母积极情绪表达氛围中的儿童,同伴接纳程度较高,教师评价的社会能力也较高(Boyum & Parke, 1995)。父母积极情绪表达与儿童的社会能力正相关,而消极情绪表达与儿童社会能力的关系则较为复杂。父母的消极情绪表达与儿童社会能力的关系可能取决于消极情绪的具体类型。只有那些充满敌意和伤害的消极情绪表达才会对儿童的社会能力产生不利影响,而那些恰当而短暂的消极情绪可能反而对儿童的社会能力具有积极作用。有研究发现通过恰当时机表达出来,且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的消极情绪对情绪的学习和调节具有积极作用。例如,非敌意的消极情绪的表达(如悲伤、尴尬、痛苦)与儿童社会能力正相关(Boyum & Parke, 1995),而充满敌意的父母情绪表达则与社会能力负相关(Eisenberg, Liew, & Piadada, 2001)。其次,新近研究表明,父母情绪表达与儿童社会能力可能也存在着间接关系。父母情绪表达首先会影响到儿童的情绪表达、理解、调节等情绪能力,进而对儿童社会能力产生作用(Eisenberg et al., 2001; Denham et al., 1997; Denham et al., 2003; Eisenberg, Liew, & Piadada, 2001; Eisenberg et al., 2003; Valiente et al., 2006)。

综上所述,从父母情绪社会化的角度来探索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现有研究表明,父母情绪社会化的理念、行为与儿童社会能力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首先,当前研究对父母情绪教导、情绪摒除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能力的关系给予了较多关注,但对父母情绪紊乱及中国文化背景中特有的情绪不干涉元情绪理念未给予足够重视。其次,现有研究更多关注了母亲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能力间的关系,而对父亲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能力间的关系关注不足。父母在儿童抚养中可能扮演着不同角色,父亲更多是以玩伴和导师的角色出现(Stover, 2003; Parke, 2002)。因此,父亲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能力的关系模式可能与母亲不同。第三,已有研究表明父母元情绪

理念与儿童社会能力除了直接关系之外,还通过一些中间因素间接影响儿童社会能力。但现有研究更多以儿童自身的心理因素作为中介变量,如儿童的生理、情绪调节能力,而对父母自身的一些变量鲜有涉及,如父母在家庭中的情绪表达等。因为父母的情绪社会化理念或目标可能首先会影响到自身的情绪表达模式,进而影响儿童的社会能力。

鉴于此,本研究同时考察父亲和母亲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能力的关系,以期发现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能力的直接关系模式。我们预期父母情绪教导、情绪不干涉对儿童的社会能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而父母情绪摒除、情绪紊乱对儿童社会能力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其次,本研究将考察父母情绪表达是否在其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能力间存在中介作用。我们预期父母情绪表达在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能力间具有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2.1.1 预测被试 问卷初次修订的被试选自北京市城区的四所幼儿园。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选取了小班、中班和大班儿童共 280 名($M_{\text{年龄}}=51.56$ 月, $SD=11.01$ 月),男女约各半。由儿童父母分别填写父亲问卷、母亲问卷。共发放问卷 280 份,回收母亲有效问卷 238 份(85%),父亲有效问卷 239 份(84%)。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的约占 70%。

2.1.2 正式被试 从兰州市一所大型幼儿园的大、中、小三个年级随机抽取了 9 个班(每个年级三个班),共 341 名儿童($M_{\text{年龄}}=52.95$ 月, $SD=9.66$ 月)及其父母作为本研究的被试,其中男孩 192 名(56.3%),女孩 149 名(43.7%)。母亲的受教育水平为大专以上的占 62%,父亲受教育水平为大专以上的占 56%。家庭人均月收入介于 800~5000 元之间($Mo=1500$ 元)。由儿童的父亲、母亲分别填写父亲问卷、母亲问卷。共发放父母问卷各 341 份,回收母亲有效问卷 296 份(占 87%),父亲有效问卷 302 份(占 88.6%)。问卷中除本研究涉及到的数据外,还收集了其他研究数据。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用父母情绪表达问卷原版为英文,故在正式研究前,由研究者本人与另外一名博士生将问卷译为中文,然后由一名在美国攻读发展心理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籍博士生回译为英文,争议之处由三人协商解决。

父母元情绪理念量表。采用叶光辉及其合作者(叶光辉 等, 2005; 叶光辉, 2002) 编制的父母元情绪理念量表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Scale)来测量父母元情绪理念。该量表共 42 个项目, 分情绪教导、情绪摒除、情绪不干涉、情绪紊乱四个分量表, 采用 Likert 式 6 点记分, 从“1”到“6”表示“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由儿童父母分别报告。

用预测数据对父母元情绪理念量表的四维结构(情绪教导、情绪摒除、情绪不干涉、情绪紊乱)进行了结构效度检验, 修正后的父母问卷的拟合指数分别为: $\chi^2=1455.85$, $df=734$, $\chi^2/df= 2.17$, NNFI=0.93, CFI=0.94, RMSEA=0.066; $\chi^2=1396.99$, $df=734$, $\chi^2/df= 1.90$, NNFI=0.91, CFI=0.92, RMSEA=0.064。父亲问卷总量表与各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72, 0.86, 0.81, 0.44, 0.82; 四个分量表一个月后的重测信度分别为: 0.76 ($p<0.01$), 0.53 ($p<0.01$), 0.45 ($p<0.01$), 0.65 ($p<0.01$)。母亲问卷总量表与各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69, 0.84, 0.75, 0.61, 0.83; 四个分量表一个月后的重测信度分别为: 0.78 ($p<0.01$), 0.51 ($p<0.01$), 0.46 ($p<0.01$), 0.75 ($p<0.01$)。

同样, 用正式样本的数据再次对该问卷的四维结构进行了验证。修正后的父母问卷拟合指数分别为: $\chi^2=1350.99$, $df=696$, $\chi^2/df= 1.94$, NNFI=0.91, CFI=0.91, RMSEA=0.058; $\chi^2=1172.47$, $df=696$, $\chi^2/df= 1.68$, NNFI=0.92, CFI=0.93, RMSEA=0.048。父亲问卷总量表与各维度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77, 0.82, 0.74, 0.50, 0.81; 母亲问卷总量表与各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77, 0.81, 0.75, 0.56, 0.81。可见, 父母元情绪理念量表效度和信度均可接受。

父母情绪表达问卷。采用 Halberstadt 及合作者 (Halberstadt et al., 1995)编制的家庭自我表达问卷 (Self-Expressiveness in the Family Questionnaire)来分别测查父母情绪表达。该问卷分积极情绪表达和消极情绪表达两个维度, 采用 Likert 式 9 点记分, 数字 1, 2, 3 表示问卷中所描述的情况从未或很少出现, 4, 5, 6 表示有时候或中等程度, 7, 8, 9 表示非常频繁。由儿童的父母分别报告。

用预测样本数据对父母情绪表达问卷的两维结构(积极情绪表达和消极情绪表达)进行验证, 模型修正后的父母问卷的拟合指数分别为: $\chi^2=1586.35$, $df=701$, $\chi^2/df= 2.26$, NNFI=0.90, CFI= 0.91,

RMSEA=0.077; $\chi^2=1477.47$, $df=699$, $\chi^2/df= 2.11$, NNFI=0.88, CFI=0.89, RMSEA=0.069。父亲问卷总量表与各维度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89, 0.88, 0.84, 一月后两个维度的重测信度分别为: 0.68 ($p<0.01$), 0.64 ($p<0.01$)。母亲问卷总量表与各维度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85, 0.89, 0.83, 一月后两个维度的重测信度分别为: 0.70 ($p<0.01$), 0.58 ($p<0.01$)。用正式样本数据对该量表的两维度结构再次验证, 修正后的父母问卷的拟合指数分别为: $\chi^2=1633.10$, $df=662$, $\chi^2/df= 2.47$, NNFI=0.92, CFI=0.92, RMSEA=0.077; $\chi^2=1679.54$, $df=701$, $\chi^2/df= 2.40$, NNFI=0.90, CFI=0.90, RMSEA=0.073。父亲问卷的总量表与各维度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87, 0.91, 0.84; 母亲问卷的总量表和各维度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88, 0.90, 0.83。可见, 家庭情绪表达问卷在本研究中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和信度。

儿童早期行为评价量表。采用儿童早期行为评价量表(父母版) (Pianta, 1992; Early School Behavior Rating Scale) 测量 3~7 岁儿童的问题行为和社会能力, 该量表由外显问题、内隐问题和社会能力分量表组成, 共 43 个项目。本研究仅使用社会能力分量表, 该量表为 Likert 式 4 点记分, 从“1”(几乎从不这样)到“4”(几乎总是这样) 分别表示题目陈述与幼儿行为的符合程度。社会能力分量表测查了儿童遵守纪律、与同伴友好相处等社会期望的行为和能力, 由儿童母亲报告。由于该问卷在中国被试中已进行了修订和使用, 且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张晓, 陈会昌, 张银娜, 孙炳海, 2008), 因此本研究并未进行结构验证。社会能力分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74。可见, 社会能力分量表在本研究中具有较好信度。

2.3 研究程序

首先, 确定问卷中译本后, 邀请 10 名学前儿童的家长, 让其针对问卷中的条目表述是否符合中国父母与儿童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价, 并提出意见与建议。根据家长意见, 对项目进行修改和调整。其次, 选取相同年龄段的预测样本对父母元情绪理念量表和情绪表达问卷进行初步修订, 分析问卷的信效度。第三, 通过幼儿园家长会征求家长意见, 邀请儿童及家长参加研究。第四, 培训主试, 并进行实测。

2.4 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

采用 Microsoft visual FoxPro 6.0 软件进行了数

据录入与管理, 用 SPSS 16.0 与 Lisrel 8.70 统计软件进行了数据整理与统计分析。主要使用了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 路径分析等统计方法。

3 研究结果

3.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本研究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量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由表 1 可知, 父母积极情绪表达、情绪

教导均与儿童社会能力显著正相关, 父亲消极情绪表达、父母情绪紊乱、母亲情绪摒除、父亲情绪不干涉均与儿童社会能力显著负相关。母亲消极情绪表达、情绪不干涉、父亲情绪摒除与儿童社会能力无显著相关。此外, 母亲情绪教导、积极情绪表达及儿童社会能力三者间的相关均较高, 可能预示着三者间存在中介关系。父亲情绪教导、积极情绪表达、消极情绪表达及儿童社会能力四者间的相关均较高, 可能预示着四者间存在中介关系。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变 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社会能力		1.00												
2 母亲积极情绪表达		0.32***	1.00											
3 母亲消极情绪表达		-0.09	0.16**	1.00										
4 母亲情绪教导		0.31***	0.34***	-0.20***	1.00									
5 母亲情绪不干涉		-0.07	-0.11	0.23***	-0.27***	1.00								
6 母亲情绪摒除		-0.13*	-0.12*	0.25***	-0.11*	0.48***	1.00							
7 母亲情绪紊乱		-0.27***	-0.11	0.43***	-0.28***	0.49***	0.55***	1.00						
8 父亲积极情绪表达		0.26***	0.33***	0.01	0.14*	-0.01	-0.03	-0.11	1.00					
9 父亲消极情绪表达		-0.22***	-0.01	0.27***	-0.08	0.14*	0.07	0.15*	-0.06	1.00				
10 父亲情绪教导		0.20***	0.24***	-0.05	0.22***	-0.09	-0.10	-0.08	0.43***	-0.30***	1.00			
11 父亲情绪不干涉		-0.12*	-0.13*	0.12*	-0.13*	0.27***	0.17**	0.18**	-0.14*	0.29***	-0.33***	1.00		
12 父亲情绪摒除		-0.11	-0.02	0.06	-0.06	0.21***	0.19**	0.12*	-0.04	0.23***	0	0.52***	1.00	
13 父亲情绪紊乱		-0.21***	-0.10	0.10	-0.09	0.15**	0.15*	0.24***	-0.18**	0.46***	-0.26***	0.56***	0.51***	1.00
总样本	<i>M</i>	40.19	134.26	56.98	64.90	27.28	19.13	21.97	123.22	47.74	61.71	27.63	19.39	21.76
(<i>n</i> =296)	<i>SD</i>	4.83	25.34	15.79	8.58	7.61	4.56	7.42	27.48	14.63	9.49	8.18	4.38	7.55
男孩	<i>M</i>	39.74	132.71	57.16	64.84	27.46	19.53	22.61	124.02	48.07	61.95	28.20	20.04	22.67
(<i>n</i> =173)	<i>SD</i>	4.70	25.40	15.94	9.12	8.10	4.69	7.41	25.38	13.89	9.18	8.54	4.50	7.78
女孩	<i>M</i>	40.83	136.44	56.74	64.98	27.01	18.58	21.07	122.14	47.28	61.39	26.84	18.50	20.52
(<i>n</i> =123)	<i>SD</i>	4.95	25.21	15.64	7.78	6.89	4.32	7.39	30.17	15.62	9.92	7.62	4.07	7.06

注: **p*<0.05; ***p*<0.01; ****p*<0.001;下同。

3.2 儿童社会能力对父母元情绪理念、情绪表达的回归分析结果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Hierarchal Regression)方法, 分别进行了儿童社会能力对其性别、年龄、父母情绪表达、父母元情绪理念的回归分析。在模型第一层进入儿童的性别和年龄, 第二层进入父母四种元情绪理念, 第三层进入父母情绪表达。由于父母四种元情绪理念之间, 以及元情绪理念与情绪表达之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因此,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 我们对预测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诊断, 结果表明预测变量之间的容忍度(Tolerance)均大于 0.2, 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 5, 可见预测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不严重(Fox, 1991)。回归分析的结果分别见表 2、表 3。

由表 2 可知, 儿童的性别和年龄均不能显著预测其社会能力。父亲情绪教导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的社会能力, 情绪紊乱显著负向预测儿童社会能力, 而情绪不干涉与情绪摒除均不能显著预测儿童社会能力。父亲积极情绪表达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社会能力, 消极情绪表达显著负向预测儿童社会能力。

由表 3 可知, 儿童的性别和年龄均不能显著预测其社会能力。母亲情绪教导能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的社会能力, 情绪摒除能显著负向预测儿童社会能力, 而母亲情绪不干涉与情绪摒除均不能显著预测儿童的社会能力。母亲积极情绪表达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社会能力, 而消极情绪表达则对儿童社会能力的预测不显著。

表 2 儿童社会能力对父亲元情绪理念、情绪表达的回归分析结果

预测变量	儿童社会能力			
	R^2	ΔR^2	β	t
第一层				
儿童性别(编码)	0.017	0.017	0.10	1.68
儿童年龄(月)			0.08	1.39
第二层				
父亲情绪教导	0.084	0.067***	0.19	3.01**
父亲情绪不干涉			0.06	0.77
父亲情绪摒除			-0.05	-0.65
父亲情绪紊乱			-0.16	-2.13*
第三层				
父亲积极情绪表达	0.135	0.051***	0.22	3.47***
父亲消极情绪表达			-0.16	-2.48**

表 3 儿童社会能力对母亲元情绪理念、情绪表达的回归分析结果

预测变量	儿童社会能力			
	R^2	ΔR^2	β	t
第一层				
儿童性别(编码)	0.022	0.022*	0.11	1.90
儿童年龄(月)			0.10	1.69
第二层				
母亲情绪教导	0.166	0.144***	0.20	3.39***
母亲情绪不干涉			0.12	1.83
母亲情绪摒除			0.01	0.08
母亲情绪紊乱			-0.23	-3.30***
第三层				
母亲积极情绪表达	0.213	0.047***	0.24	4.04***
母亲消极情绪表达			-0.02	-0.31

3.3 父母情绪表达的中介效应分析

由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结果可知,母亲情绪教导、积极情绪表达对儿童社会能力的预测均显著,同时母亲情绪教导与积极情绪表达显著相关。父亲情绪教导与情绪紊乱对儿童社会能力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父亲积极情绪表达和消极情绪表达对儿童社会能力也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同时,父亲情绪教导、情绪紊乱与父亲积极情绪表达、消极情绪表达显著相关。因此,根据中介效应是否存在的判断标准(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2004),我们认为除了直接作用外,母亲情绪教导可能通过其积极情绪表达对儿童的社会能力起到间接作用。另外,父亲积极情绪表达、消极情绪表达在父亲情绪教导与儿童社会能力间具有中介作用,父亲消极情绪表达在父亲情绪紊乱与儿童的社会能力间具有中介作用。我们采用路径分析法,

分别检验了母亲积极情绪表达的中介效应及父亲积极与消极情绪表达的中介效应,结果分别见图1,图2。

在母亲积极情绪表达的中介效应模型中,我们设定母亲情绪教导为预测变量,母亲积极情绪表达为中介变量,儿童社会能力为结果变量,并设定模型为饱和模型,如图1所示。用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方法对该模型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母亲情绪教导对儿童社会能力的总效应($\beta=0.23+0.34\times 0.24=0.31$, $t=5.57$, $p<0.001$)、直接效应($\beta=0.23$, $t=4.03$, $p<0.001$)及间接效应($\gamma=0.34\times 0.24=0.08$, $t=3.50$, $p<0.001$)均显著。母亲情绪教导对其积极情绪表达以及儿童社会能力的方差解释率(R^2)分别为12%,15%。母亲积极情绪表达对儿童社会能力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08/0.31$) $\times 100\%=25.8\%$ 。说明母亲情绪教导对儿童社会能力既有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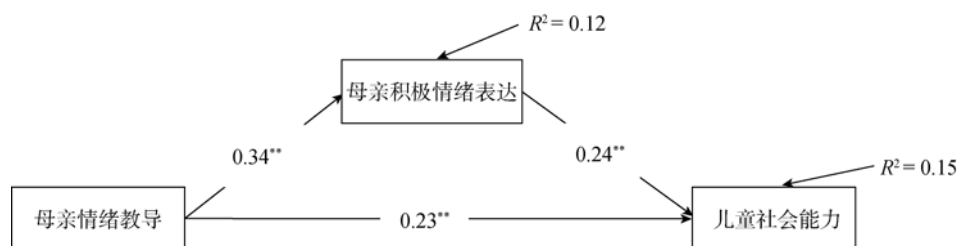


图1 母亲积极情绪表达在其情绪教导与儿童社会能力间的中介模型

注: 该图只列出了模型的结构部分, 以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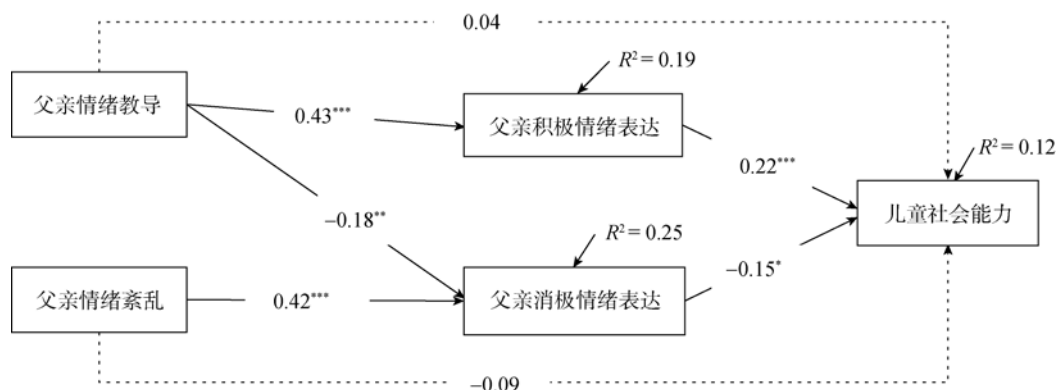


图2 父亲情绪表达在其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能力间的中介模型

注: 虚线表示路径系数不显著。

接促进作用, 又通过其情绪表达对儿童社会能力产生间接促进作用。

在父亲情绪表达的中介模型中, 我们设定父亲情绪教导、情绪紊乱为预测变量, 父亲积极情绪表达与消极情绪表达为中介变量, 儿童社会能力为结果变量。同样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法, 对模型进行了验证比较, 从中选出最优模型, 结果如图2所示。父亲情绪表达在其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能力间的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数为: $\chi^2=4.27$, $df=2$, $\chi^2/df=2.13$, $NFI=0.98$, $NNFI=0.95$, $CFI=0.99$, $RMSEA=0.061$ 。由图2可知, 父亲情绪教导对儿童社会能力的总效应 [$\beta=0.43 \times 0.22 + (-0.18) \times (-0.15) + 0.04=0.16$, $t=2.82$, $p<0.01$], 间接效应 ($\beta=0.43 \times 0.22 + (-0.18) \times (-0.15)=0.12$, $t=3.78$, $p<0.001$) 均非常显著, 但直接效应 ($\beta=0.04$, $t=0.69$, $p>0.05$) 不显著。父亲积极情绪表达、消极情绪表达在其情绪教导与儿童社会能力间的中介效应比例为: $(0.12/0.16) \times 100\%=75\%$ 。说明父亲积极、消极情绪表达在其情绪教导与儿童社会能力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父亲情绪教导对儿童社会能力的促进作用完全通过其积极或消极情绪表达来实现, 其中一条路径是通过其积极情绪表达对

儿童社会能力起间接促进作用, 另一条路径是通过其消极情绪表达的抑制来促进儿童社会能力。

此外, 父亲情绪紊乱对儿童社会能力的总效应 [$\beta=0.42 \times (-0.15) + (-0.09) = -0.16$, $t=-2.73$, $p<0.01$], 间接效应 [$\gamma=0.42 \times (-0.15) = -0.06$, $t=-2.29$, $p<0.05$] 均显著, 但直接效应 ($\beta=-0.09$, $t=-1.49$, $p>0.05$) 不显著。父亲消极情绪表达在其情绪紊乱与儿童社会能力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0.06)/(-0.16)] \times 100\%=37.5\%$ 。说明父亲消极情绪表达在其情绪紊乱与儿童社会能力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父亲情绪紊乱通过其消极情绪表达对儿童社会能力起延缓或阻碍作用。父亲情绪教导、情绪紊乱对其积极、消极情绪表达及儿童社会能力的方差解释率 (R^2) 分别为 19%, 25%, 12%。

4 讨论

4.1 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能力的关系

从结果来看, 父亲情绪教导对儿童社会能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而情绪紊乱对儿童社会能力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说明父亲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能力存在着直接预测关系, 这与本研究的预期基本一

致。由于已有研究对父亲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能力间关系的关注较少,所以相关的研究证据相对比较薄弱。有研究表明,父亲情绪教导与儿童同伴地位显著正相关(Stover, 2003)。此外,现有研究更多关注了父母情绪教导与情绪摒除与儿童社会能力的关系,但很少关注父母情绪不干涉及情绪紊乱与儿童社会能力的关系,而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父亲情绪紊乱对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不利,从而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为父亲元情绪理念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增添了新证据。如果父亲面对自我或儿童情绪反应时,容易情绪泛滥,对于调节自我和儿童的情绪感到无能为力,难以从消极情绪中恢复或自拔,则可能使父子互动处在一种消极的情绪氛围中,会对儿童的人际互动模式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影响儿童的同伴互动,对儿童社会能力产生阻碍作用。

本研究也发现母亲情绪教导对儿童社会能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母亲情绪紊乱对儿童社会能力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这与本研究预期及前人研究结果一致。母亲情绪教导可以促进儿童社会能力(Lunkenheimer et al., 2007; Katz & Windecker-Nelson, 2004),而情绪紊乱可能会对儿童社会能力具有负面效应(叶光辉, 2002; 叶光辉 等, 2005)。本研究中,母亲情绪摒除不能显著预测儿童社会能力,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不一致,西方的一些研究发现母亲情绪摒除对儿童的社会能力或社会行为会产生消极影响(Lagacé-Séguin & Coplan, 2005; Lunkenheimer et al., 2007),而在本研究中并未得到证实。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源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西方文化更强调个体的情绪感受和表达,鼓励个体表达自己的各种情绪,认为如果对个体负面情绪进行压抑或摒弃,则会对个体的社会情绪发展产生不利影响(Eisenberg et al., 1998)。所以,在西方文化中,持有情绪摒除的母亲,对儿童的社会能力会产生不利影响。而中国文化更加强调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情绪氛围,不鼓励个体充分表达自己的负面情绪,反而鼓励个体要克制自己的负面情绪,不应在他人面前表现出负面情绪(叶光辉, 2002; Chen & French, 2008)。因此,中国母亲对其孩子消极情绪的压抑或摒除,是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所以不一定会对儿童的社会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可能与本研究与西方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关。在前人的研究中,其被试处于学龄阶段(Lagacé-Séguin & Coplan, 2005),而本

研究关注的是学前儿童。儿童在每个发展阶段,父母情绪社会化的理念对儿童社会能力所起的作用可能不同,两个年龄阶段的儿童所处的环境不同,受到父母和教师等成人的监督和干预不同。

4.2 父母情绪表达与儿童社会能力的关系

本研究的结果与研究假设基本一致,父亲在家庭中的积极情绪表达对儿童的社会能力具有促进作用,而消极情绪表达则对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不利。父亲在儿童社会化中主要扮演着指导者、玩伴角色(Grossman, Kindler, & Strasser, 2003; Parke, 2002),父亲是家庭情绪氛围营造的主要贡献者之一,父亲如果经常在家庭中表现出积极情绪,会营造出一种安全的家庭情绪氛围,生活在这种情绪氛围中的儿童,更愿意接纳和内化父母的规则和要求,模仿或习得父母的情绪表达模式,从而表现出更强的社会能力。反之,则会营造出一种消极、紧张的家庭情绪氛围,对儿童的社会能力产生阻碍作用(Eisenberg et al., 2001; Eisenberg et al., 2003; Valiente et al., 2006; McElwain, Halberstadt, & Volling 2007)。由此可见,父亲的情绪表达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本研究中,母亲积极情绪表达对儿童社会能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而消极情绪表达则对儿童社会能力无显著预测作用。母亲对儿童表现出支持或积极的情绪可能会帮助儿童管理自己的悲伤情绪,成功应对压力情境,母亲的积极情绪表达对儿童解释或理解他人情绪具有示范作用,对儿童在社交情境中表达出适当的情绪具有重要参考作用(Eisenberg et al., 1998; Denham & Burton, 2003)。此外,母亲在家庭中经常表现出积极情绪,对营造良好、温暖的家庭情绪氛围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儿童在和谐的家庭情绪氛围中,更容易接纳或模仿母亲的情绪表达模式,从而把这种模式带入到家庭之外的社交场合,形成良好的社会技能(Denham et al., 2000; Eisenberg et al., 2003; Valiente et al., 2006)。母亲消极情绪表达与儿童社会能力的关系可能取决于消极情绪的具体类型,只有充满敌意和伤害的消极情绪表达才会对儿童的社会能力产生不利影响,而恰当而短暂的消极情绪可能反而对儿童的社会能力有利。如非敌意的消极情绪的表达(如悲伤、尴尬、痛苦)与儿童社会能力正相关(Boyum & Parke, 1995),而充满敌意的母亲情绪表达则与儿童社会能力负相关(Eisenberg, Liew, & Piadada, 2001)。本研究中的父母消极情绪表达可能既包含了敌意的

消极情绪,也包含了非敌意的消极情绪,并未对二者明确区分,这也是本研究的不足之一,希望在将来的研究中改进,从而更加深入地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

4.3 父母情绪表达在其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能力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母亲情绪教导除对儿童社会能力产生直接作用外,还通过其积极情绪表达对儿童社会能力具有间接促进作用。父亲情绪教导通过其积极情绪表达对儿童社会能力具有间接促进作用,同时通过对消极情绪表达的抑制,进而促进儿童社会能力。以往研究更多关注了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对儿童社会能力的直接作用,以及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通过儿童情绪能力对儿童社会能力的间接作用(Denham & Grout, 1993; Denham et al., 2000; Denham, 2010; Eisenberg et al., 2003; Valiente et al., 2006)。本研究发现,父母的情绪社会化行为可能首先会受到其情绪社会化理念的影响,进而影响儿童社会能力,即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的因素不仅来自儿童,也可能来自父母本身。

实际上,父母的养育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养育行为(NIHCD, 2004)。父母持有什么样的元情绪理念,可能会在家庭中表现出与之相一致的情绪。母亲对儿童情绪持有积极或接纳的理念,认为儿童消极情绪的表达,是一个亲近或教导的好机会,会对儿童的情绪反应积极接纳(Gottman et al., 1996, 1997)。母亲的情绪社会化目标或理念除了对儿童的社会能力产生直接作用外,可能还通过其自身的情绪表达行为对儿童的社会能力产生间接影响。持有情绪教导元情绪理念的母亲,可能在家庭中更多表现出积极情绪,对儿童的情绪反应更加敏感和温暖,学前儿童通过对母亲积极情绪表达的模仿与内化,表现出社会期望的行为。

父亲情绪教导通过其积极或消极情绪表达间接地促进儿童社会能力。一方面,情绪教导元情绪理念占主导的父亲,认为对儿童的情绪反应应予以积极接纳(Gottman et al., 1996, 1997)。因此,在与儿童的交往中,表达出更多积极的情绪,对儿童的情绪反应敏感,从而营造良好的家庭情绪氛围。在良好的家庭情绪氛围中,儿童更乐于接纳或模仿父亲的情绪表达模式。另一方面,情绪教导元情绪理念占主导的父亲,即使在家庭中表达消极情绪,也更多是低强度的消极情绪或没有敌意的消极情绪,而

这种“软”消极情绪让儿童觉得父亲的情绪并不带有敌意,自己处于安全的家庭情绪氛围中,从而内化父亲的期望和要求,进而促进儿童社会能力(Eisenberg et al., 1998, 2001)。另外,本研究发现情绪紊乱元情绪理念占主导的父亲,其可能在家庭中情绪更容易失控,更容易表达消极情绪,使得整个家庭处在一种消极的情绪氛围,对亲子互动产生不利影响,使儿童形成一种消极的人际互动模式,进而对儿童社会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父亲作为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导师和玩伴,其情绪表达被儿童作为模仿的榜样,因而一个无法很好调控自我消极情绪的父亲,也不可能成为儿童模仿的一个好榜样,从而影响儿童的社会能力。

4.4 本研究的局限及展望

尽管本研究从父母情绪社会化的视角出发,考察了父母元情绪理念、情绪表达与儿童社会能力的关系,并且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但仍然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首先,本研究是一项横断研究,虽能够说明父母元情绪理念、情绪表达与儿童社会能力的相关关系,但却无法揭示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结果的推论上具有较大局限。因此,将来的研究要进一步采用追踪研究来说明父母情绪理念及情绪表达对儿童社会能力的作用机制。其次,本研究最初采用了母亲报告与教师报告等多种数据来源的方式来测查儿童社会能力,但结果表明父母元情绪理念、情绪表达对教师报告的儿童社会能力的预测均不显著。其中可能的原因有很多种,既有父母与教师评价标准的问题,也有情境效应的问题。因此,在文中仅呈现了母亲报告的儿童社会能力,这样不可避免地带来共同方差偏差的问题。在将来的研究中,要尽可能采用多种数据来源,如父母报告、教师评价(每个班选取少量儿童,尽可能扩大班级数量)、研究者观察等多种方法,以避免共同方差偏差问题,提高研究的效度。最后,本研究的样本的代表性有一定的局限性,仅选取了某一地区的儿童,在将来的研究中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尽可能从多个地区取样。

5 研究结论

(1) 父母情绪教导对儿童社会能力起促进作用,而情绪紊乱对儿童社会能力发展不利。

(2) 父母积极情绪表达能促进儿童社会能力,但父亲消极情绪表达对儿童社会能力有负面作用,而母亲消极情绪表达对儿童社会能力的预测作用

不显著。

(3) 父亲情绪教导通过促进其积极情绪表达或抑制其消极情绪表达对儿童社会能力产生间接的积极作用, 母亲情绪教导除直接促进作用外, 还通过其积极情绪表达对儿童社会能力产生间接促进作用。

参 考 文 献

- Boyum, L. A., & Parke, R. D. (1995). The role of family emotional expressiven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7(3), 593-608.
- Chaplin, T. M., Cole, P. M., & Zahn-Waxler, C. (2005). Parental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 expression: Gender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 to child adjustment. *Emotion*, 5(1), 80-88.
- Chen, X. Y., & French, D. C. (2008).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in cultural contex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9, 591-616.
- Denham, S. A. (2010). Emotional competence in preschooler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functioning. In J. Luby (Ed.), *Handbook of preschool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disorders, and treatment*. New York: Guilford (In press).
- Denham, S. A., & Burton, R. (2003). *Social and emotional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programming for preschoolers*.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 Dunn, J., & Brown, J. R. (1994). Affect expression in the family,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emotion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others.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40(1), 120-137.
- Denham, S. A., Blair, K. A., DeMulder, E., Levitas, J., Sawyer, K., Auerbach-Major, S., et al. (2003). Preschool emotional competence: Pathway to social competence. *Child Development*, 74(1), 238-256.
- Denham, S. A., & Groot, L. (1993).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 Pathway to preschoolers' emotional and social competence.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17(3), 205-227.
- Denham, S. A., Mitchell-Copeland, J., Strandberg, K., Auerbach, S., & Blair, K. (1997). Parental contributions to preschoolers' emotional competenc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Motivation and Emotion*, 21(1), 65-86.
- Denham, S. A., Workman, E., Cole, P. M., Weissbrod, C., Kendziora, K. T., & Zahn-Waxler, C. (2000). Prediction of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from early to middle childhood: The role of parental socialization and emotion expression.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2(1), 23-45.
- Eisenberg, N., Cumberland, A., & Spinrad, T. L. (1998). Parental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 *Psychological Inquiry*, 9, 241-273.
- Eisenberg, N., Gershoff, E. T., Fabes, R. A., Shepard, S. A., Cumberland, A. J., Losoya, S. H., et al. (2001). Mother's emotional expressivity and children's behavior problems and social competence: Mediation through children's regula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7(4), 475-490.
- Eisenberg, N., Liew, J., & Pidada, S. U. (2001). The relations of parental emotional expressivity with quality of Indonesian children's social functioning. *Emotion*, 1(2), 116-136.
- Eisenberg, N., Valiente, C., Morris, A. S., Fabes, R. A., Cumberland, A., Reiser, M., et al. (2003). Longitudinal relations among parental emotional expressivity, children's regulation, and quality of socioemotional function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9(1), 3-19.
- Fox, J. (1991). *Regression diagnostic*.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
- Gottman, J. M., Katz, L. F., & Hooven, C. (1996).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and the emotional life of familie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preliminary data.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0(3), 243-268.
- Gottman, J. M., Katz, L. F., & Hooven, C. (1997). *Meta-emotion: How families communicate emotionally*.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Grossman, K., Kindler, H., & Strasser, K. (2003, April). Father support during early childhood: Effects on adolescents' representations of attachment and partnership.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Tampa, FL.
- Halberstadt, A. G., Cassidy, J., Stifter, C. A., Parke, R. D., & Fox, N. A. (1995). Self-expressiveness within the family context: Psychometric support for a new measur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7, 93-103.
- Isley, S. L., O'Neil, R., Clatfelter, D., & Parke, R. D. (1999). Parent and child expressed affect and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Modeling direct and indirect pathway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5(2), 547-560.
- Katz, L. F., & Hunter, E. C. (2007). Matern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and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Social Development*, 16(2), 343-360.
- Katz, L. F., & Windecker-Nelson, B. (2004).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in families with conduct-problem children: Links with peer relation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2(4), 385-398.
- Katz, L. F., & Windecker-Nelson, B. (2006). Domestic violence, emotion coaching, and child adjustment.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1), 56-67.
- Lagacé-Séguin, D. G., & Coplan, R. J. (2005). Maternal emotional styles and child social adjustment: Assessment, correlates, outcomes and goodness of fit in early childhood. *Social Development*, 14(4), 613-636.
- Lunkenheimer, E. S., Shields, A. M., & Cortina, K. S. (2007). Parental emotion coaching and dismissing in family interaction. *Social Development*, 16(2), 232-248.
- McElwain, N. L., Halberstadt, A. G., & Volling, B. L. (2007). Mother- and father-reported reactions to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relations to young children's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quality. *Child Development*, 78(5), 1407-1425.
-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2004). Fathers' and mothers' parenting behavior and beliefs as predictors of children's social adjustment in the transition to school.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8(4), 628-638.
- Parke, R. D. (2002). Fathers and families. In M. H. Bornstein (Ed.), *Handbook of parenting: Vol. 3. Being and becoming a parent* (2nd ed., pp. 27-73). Mahwah, NJ: Erlbaum.
- Parke, R. D., & Buriel, R. (1998). Socialization in the family: Ethnic and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W. Damon (Series Ed.) & N. Eisenberg (Vol.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Social, emotion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Vol. 3, pp. 463-552). New York: Wiley.
- Pianta, R. C. (1992). *The early school behavior rating scale* (Parent version & Teacher version).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 Rose-Krasnor, L. (1997). The nature of social competence: A theoretical review. *Social Development*, 6(1), 111-135.
- Stover, J. (2003). *Fathers' meta-emotion and children's social statu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eattle Pacific University.
- Valiente, C., Eisenberg, N., Spinrad, T. L., Reiser, M., Cumberland, A., Losoya, S. H., et al. (2006). Relations among mothers' expressivity, children's effortful control, and their problem behaviors: A four year longitudinal study. *Emotion*, 6(3), 459-472.
- Wen, Z. L., Chang, L., Hau, K. T., & Liu, H. Y. (2004). Test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6(5), 614-620.
-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刘红云. (2004).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 *心理学报*, 36(5), 614-620.]
- Yeh, K. H. (2002).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type and measurement. In T. L. Hu, M. T. Hsu, & K. H. Yeh (Eds.), *Effect, emotion and culture: Taiwan societal cultur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Taipei Nanga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Academia Sinica, Wunan Book Co., Ltd..
- [叶光辉. (2002). 父母的后设情绪理念类型及测量. 见 胡台丽, 许木柱, 叶光辉 (主编). *情感、情绪与文化: 台湾社会的文化心理研究*. 台北南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 Yeh, K. H., Cheng, S. P., & Yang, Y. J. (2005). The influence of matern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on children's attachment inclin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47(2), 181-195.
- [叶光辉, 郑欣佩, 杨永端. (2005). 母亲的后设情绪理念对国小子女依附倾向的影响. *中华心理月刊*, 47(2), 181-195.]
- Zhang, X., Chen, H. C., Zhang, Y. N., & Sun, B. H. (2009). Family income and social competence in early childhood: Examining 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effect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1(7), 613-623.
- [张晓, 陈会昌, 张银娜, 孙炳海. (2009). 家庭收入与儿童早期的社会能力: 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 *心理学报*, 41(7), 613-623.]

Relations among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Parental Emotion Expressivity, and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LIANG Zong-Bao¹; ZHANG Guang-Zhen¹; CHEN Hui-Chang²; ZHANG Ping³

(¹ Research Center for Learning Science/Key Laboratory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Scienc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² School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³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al and Public Polic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refers to parents' feelings and behaviors toward their own and their children's emotions. It reflects parental beliefs about emotion socialization. Research has indicated that maternal positive meta-emotion philosophy (e.g. emotion coaching) is associated with children's emotional competence, social competence and that maternal negative meta-emotion philosophy (etc. emotion dismissing) is related with children's behavior problem.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patern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Moreover, there is inadequate research on parental emotion noninvolvement and emotion dysfunction.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children's competence may be a mediator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arental emotion socialization belief or goal and children's social outcomes. It is also reasonable to argue that parents' beliefs or goals about emotion may also affect their own emotion-related behavior and emotion expressivity. As such, parental emotion expressivity may play a mediated role in relations between parental emotion-related beliefs and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The current study explored relations among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emotion expressivity, and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We hypothesized that parental emotion expressivity would medi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and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Three hundred and forty one children aged 3-5 years and their par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Child social competence was assessed using the Early School Behavior Rating Scale reported by mothers. Fathers and mothers reported their own emotion

expressivity using the Self-Expressiveness in the Family Questionnaire and meta-emotion philosophy using the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Scal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es and path analyse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First, paternal emotion coaching philosophy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and paternal emotion dysfunction philosophy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Paternal positive expressivity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whereas paternal negative emotional expressivity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Paternal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 expressivity mediated relations between paternal emotion coaching and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In addition, paternal negative emotion expressivity mediated relations between paternal emotion dysfunction and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Second, maternal emotion coaching philosophy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and maternal emotion dysfunctional philosophy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Further, maternal positive emotional expressivity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but negative emotional expressivity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The relation between maternal emotion coaching and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was mediated by maternal emotion expressivity.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arental emotion-related beliefs or goals not only were 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but also had indirect effects on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through emotion-related reflection and behavior.

Key words preschoolers,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parental emotion expressivity, social competence, mediating effects